

梁漱溟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探析

张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知名社会学者梁漱溟认识到，对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认识有利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于是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出路。他指出，出于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中国应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但是要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全盘西化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现实性。他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分析，在肯定其内核的同时进行批判的研究手法。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建立在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古代没有阶级对立而形成了职业分途等他一直坚持的理论上，这些理论为他的无国家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的论述在一定的话语体系下更加符合逻辑，但也在暴露出存在的问题。

关 键 词： 封建解体；职业分途；政治伦理化；传统文化

An analysis of Liang Shuming's theory of statelessness in ancient China

Zhang Y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Since the 1920s, the famous sociologist Liang Shuming realized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out for Chinese culture would be conducive to solving China's social problems, so he began to do research on the way out for Chinese culture. He pointed out that for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asons, China should accept Western science and democracy, but oppose total Westernization. He believed that total Westernization was not realistic to a certain extent. After analyzing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using a critical research method while affirming its core, Liang Shuming proposed the theory of ancient China without a state in "The Essentials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theory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Chinese society was an ethical society, which formed a division of occupations, and there was no class cleavage in ancient China. These theorie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theory of no state, making his argument more logical under a certain discourse system, but also exposed existing problems.

Keywords： feudalism disintegration; occupational division; political ethic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对中国古代无国家这一理论进行论述，他的论述整体循着伦理本位社会——家庭生活而无团体生活的个人——无阶级对立而只有职业分途的社会——中国古代无国家这一逻辑链条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条单向的路径，这一路径中任何两个步骤都能相互影响和作用，从根源处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中国社会中每一个细小的细节。

一、梁漱溟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的内容

梁漱溟对于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的分析分为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从大的视角指出中国古代没有国家的原因和表现。首先，梁漱溟认为，古代中国缺乏国家应有的功能，具体表现为中国政治上表现出的消极无为。在中国古代，“不扰民是其最大心跳，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1]，很多人认为，这一现象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的确，这样的表现在某些方面受到黄老无为而治的影响，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国家应有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社会，但社会构造也会对国家起到的作用进行反作用。因此，在政治上的消极无为可能也出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

造的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在无论是限制个人还是维护秩序等社会构造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这样的社会构造对国家的需要就是无为而治。

其次，梁漱溟指出，中国古代缺乏国际对抗性。在他看来，国家的功能有两方面，分别是对内和对外，中国政治对内松弛，对外也不紧张。国家功能的缺乏表现在以下四个角度：一是中国古代疏于国防，对于海防等等丝毫不在意，甚至可以让人掌握海防并且在水路上引路；二是户籍地籍等等各种国势调查中国自己都说不清；三是中国古代重文轻武，民不习兵，几乎是“无兵之国”。这里的无兵是说兵与民隔离的局面非常明显，兵在社会中地位比较低的同时在社会中同其他社会成分缺联系。^[2] 四是中国

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3]。梁漱溟指出国家、社会等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而是解海禁之后输入的新观念，在此之前，中国奉行文化至上，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或者国家共同体。

第二个维度是中国古代没有国家概念中所必需的阶级统治。他认为国家概念中非常重要的要素是阶级统治，这一思想受到奥本海默的影响，他的书中提到“奥本海默指出：与国家观念相对立的社会观念，最初于洛克见之，从此以来，此种对立愈益确定”^[4]。梁漱溟在定义国家时，将社会从国家观念中区分出来，认为中国古代有社会而无国家，他还将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区分：社会是从经济手段而来，而国家则起源于政治生活，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的区别是经济手段是人们自己劳动，或者以自己劳动与别人劳动为等价交换，而政治手段是强把人劳动无代价收夺过来。梁漱溟详细阐述了国家有阶级的必要性：国家作为一种武力工具需要一个主体的操持，这个主体就是阶级。具体来说，国家有抵御外来侵扰、镇压国内混乱和给社会提供安定和秩序的责任，因此武力应该属于国家，国家就是它的主体，但是国家构成于阶级，中国则没有阶级，所以没有武力的主体而难以进行统治。

第三个维度，梁漱溟认为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封建解体的发展进行分析。西方社会在封建解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间的政治表现为王权集中，而中国在封建解体之后也表现为王权集中，但这一集中持续了两千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长期停滞，这一差异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导向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没有阶级、团体和国家的原因多样，有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原因，也有封建解体后产生的新原因，梁漱溟对这些原因进行了探索。

由于当时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脱离封建制度存在争论，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代脱离了封建制度。首先，他认为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其耕作者之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性剥削，其经济表现为自然经济，社会体现是身份隶属关系，政治反映是“星罗棋布的大小单位”，意识的呈现是宗教迷信。封建解体就是这几种表现的消失，其中最重要的点在于强制剥削的消失。封建解体的方式随着地域和时代的变化而不同。梁漱溟的支撑观点在于耕作者附属于土地而不得离开即附属的人身关系已不存在，这为强制性剥削的消失提供了证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作者认为也没有宗教存在。^[5]因此，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这四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摆脱了封建。

梁漱溟对中国和西方封建解体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对比。西方的封建解体出于都市的新兴势力的抗争侵逼，而中国则起源于内部的分化融解。抽象来看，西方封建制度的解体是阶级对阶级，集体对集体，最后新的阶级胜出。^[6]而中国社会的士人十分分散，难以形成阶级，贵族阶级同样十分松散，导致社会中的阶级分化逐渐消解，被职业的分化所替代，这之后的社会处于一种更加散漫的状态。西方社会通过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制度，形成了阶级政治，文化和政治也随之变化，而中国则是从士人群体出发推动封建解体，但在这之后，并未形成新的阶级。

封建制度解体之后，西方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王权集中后再无大的变动，就这样循环往复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梁漱溟认为，不是由经济手段决定文化和政治，而正是相反，文化和政治影响了经济。“由政治势力而直接或间接地使土地见出集中垄断之势，那对于从封建中解放出来的社会说，即是形势逆转。此种逆转，势不可久，历史上不断表演，不断收场。”^[7]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一直控制着经济政策，随着“一乱一治”而不断放松收紧经济政策，防止经济的变动，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也是以文化和政治开端，具体表现在贵族阶级的融解和士人的出现。西方封建阶级的维持建立在武力之上，并且以宗教维系。

梁漱溟对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研究的第四个维度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的特殊性。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化，也就是说把政治作为伦理间的事。伦理本位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特点，“伦理本位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伦理本位体现为财产的所有和在法律中表现出来的方式。从财产所有角度来看，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社会的经济方式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和以社会为本位的苏联的经济方式都不同，它更注重伦理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比如，在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在世的时候，以大家长为中心发散的父系家庭必须保持财产的共有来维持家庭的运转，以更好的保护伦理社会中的秩序关系，若大家长去世，这个家庭就失去了存在的最大的伦理根据和根本，所以家庭会再次进行分散，因此财产进行再次分割，以维持新产生的以新的大家长为中心发散的父系家庭。这样的经济形式由伦理本位的文化决定，但也反过来加深了伦理本位文化，促进了伦理本位社会的发展。从法律方面的体现来讲，伦理本位下的中国社会中，法律的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不是权利观念，因此中国的法律一直忽略债权和物权的问题。

就政治方面而言，政治是团体公共的事，但一个家族不仅会形成自己的范围和自己的中枢，还有公共事务，这部分满足了政治的要求，但是这样的集团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团体，所以家庭中公共的事并不是政治，中国古代只有对君臣和官民之间伦理的义务，而没有国民和国家的团体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不仅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分别，也没有刑法和民法的区别。

从意识形态角度论，中国缺乏宗教，因此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宗教的作用时给人提供一个倾诉的场合，提供一种心灵上的寄托，给人以安慰。而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单大大减少了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也给人提供了进行倾诉的场合和可以倾诉的对象。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流动性强，这也推动了家庭内部的团结，给予家庭伦理以极大的鼓励作用。

其次，中国古代没有阶级的存在而只是职业分途，社会上不存在分离对峙，所以分权制度无法产生，也没有以此为背景的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然而，这导致权力一元化者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由于君主不能完全地掌握权力的每一方面和每一个细枝末节，因此一些权力必须下放到官员手中，官吏会在发挥相应作用，因此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大权在握，不受限制，但他们经常进行反省活动。

第五个维度中，梁漱溟对西方政治进步的原因进行分析。西方封建经济解体之后，政治一步接一步地促进其社会阶级和以阶级作为阶梯的发展，因此阶级在西方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民主的目标是尊重人权，而民族的开端是限制人权。限制人权和尊重人权这两点的视线都是要借助于阶级的力量和阶级力量的相争而得以均衡，个人力量在阶级力量的支撑下才能更好、更完善和更加充实地发展起来。这样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完整的，而社会秩序基于理性并且稳定，到这一情况下，阶级就失去了作用，社会也就没有阶级了。不容忽视的是，政治民主中所要追求的政权公开也能够通过阶级发展出来，而产业革命的二百年间所有的工具发明和文化进步十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政治除了能杜绝了封建的大小战争，给社会提供长期的安定和平静，还能突破封建带来的束缚和限制，对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提供很大的解放。

总的来说，西方因为阶级的存在而满足了一个国家需要的最基础的构成要素，它的阶级推动它实现政治上的进步，而中国由于缺乏阶级所用从最根本处断绝了进步的机会。这就是西方为什么走向进步而中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处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下的原因。

二、梁漱溟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的优缺点

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不断地变动和承袭，最终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出现了问题，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抗中处于劣势，对于中国文化的怀疑和否定不停地出现，但是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理性精神和伦理道德对于人类追求的美德来说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文化中“早熟”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高的进步性。^[5] 因为中国现实问题而一味地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可以在梁漱溟的研究中得到新的思路。

梁漱溟的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的点在于其采纳的比较历史视野。在研究中，他一直坚持将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从包含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和包含一个地域的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到对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从纵向对比。由于近代中国的很多观念都从西方引进，从而对中国的政治进行套用，进一步对中国社会进行探究，所以分析这些概念和它们所描述的现象产

生原因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能推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探索。^[7] 对适用的、可实现的并且优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可加以利用实现，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的，不仅可通过借鉴经验避免重蹈覆辙，也可以通过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进行改造和适用，防止走很多弯路。梁漱溟的比较视野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阔、更加宏观的视野。

除此之外，梁漱溟的研究向中国学术界宣告，在民族遭遇重创的情况下，一味引用外来文化来解决本国问题并不可取。处于地理位置和社会传统等各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南辕北辙，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不能完全的抛弃。^[8] 中国古代无国家理论在此时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內芯，同时采取西方社会的长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以这样的结合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实现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重建。

与此同时，梁漱溟的研究中缺乏流动的观点这一缺点也值得引起注意。在中国缺乏阶级对立的研究中，他指出，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生产工具与生产劳动的剥离，所以没有构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局面，也没有形成两个既矛盾又相互联系的团体，政治上也就没有构成统治与被统治两面，这样的观点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一观点的得出建立在一定样本的基础上，但这些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问题值得引起深思。同时在中国古代，土地的垄断状况并不是完全不存在，土地人人都有状况也并不一定长期稳定持续，这些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发生不同变化，而梁漱溟否定了历史的变动性，把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恒久不变的个体来看待，这一缺点值得学者在研究中时刻为鉴。

总的来说，在梁漱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高度肯定，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事实上殊途同归，这证明他仍然坚持中国古代的传统精神，并且认为坚持中国的传统精神的内核的同时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才是最根本、最利于当时中国发展的道路。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学说虽然在很多方面和西方社会所追求的精神和现象不同，但是其实更进一步，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与此同义，由于中西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文化不适合中国的未来发展的观点，由没有完全理解中国古代精神和文化造成。

参考文献

-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2。
- [3] 陈来：《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261-269页。
- [4] 马勇著：《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6] 王悦：《从文化哲学走向乡村建设：梁漱溟的变与不变》，《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第77-86页。
- [7] 丁耘：《论中华传统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基础》，《文化纵横》2011年第1期，第93-100页。
- [8] 程农：《为什么新儒家需要一个文化－历史哲学——以梁漱溟为案例》，《中国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04-111页。